

# 民族奋进历程的具象呈现

——评《独龙悠歌》

□顾广梅(回族)



云南省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独龙江乡新貌

民族国家的历史记忆与现实图景,在文学世界中有着多元的审美表达。《独龙悠歌》以独龙族百年的沧桑变迁为叙事核心,熔纪实实录与诗意咏叹于一炉,既恪守纪实文学的真实性与主题性,又兼具意境悠远、余韵绵长的审美品格。作者王鸿鹏秉持现实主义精神,于独龙族的百年时空里打捞历史细节,叩问民族命运与时代主潮的深层关联,深刻诠释“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真谛,鲜明彰显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独龙悠歌》的价值,不仅在于勾勒独龙族的百年发展史,更在于深掘这一民族的心灵轨迹。要完成这样一部兼具历史性与文学性的作品,离不开扎实的田野调查与文献深耕。面对陌生的书写对象,王鸿鹏三赴独龙江,展开沉浸式走访,打捞个体记忆与民族记忆,搜集散落的文献珍存。他摒弃对象化、客观化的疏离视角,以同气连枝的人文情怀,构建起与独龙族同胞休戚与共的共情之心。唯有浸润这股责任感与使命感,方能真正走进书写对象的精神深处。王鸿鹏无疑交出了令人信服的答卷。

作品开篇低沉回郁,具象化呈现民族心灵历经考验的漫长历程,让“落后就要受欺”的历史箴言变得可触可感。作者在展现“一条江的苦难”中,不刻意渲染悲剧的凄怆,更不流于煽情的表象,而是以克制的笔触、严谨的态度,在一桩桩令人扼腕的史实中,探究艰辛背后的根源与本质。随着叙事的铺展,夹叙夹议的笔法渐次深化,作者的历史理性愈发凸显,掷地有声地作出判语:“独龙人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也是一部争取民族权利、尊严、平等和自由的斗争史。”这部作品始终秉持清晰的大历史观与辩证的历史意识,多维透视边疆民族的成长之路与心灵嬗变,有力印证了“优秀的纪实文学绝非史料的堆砌,现象的罗列,唯有穿透表象,直抵本质,方能拥有启迪人心的文学深度”。

《独龙悠歌》的另一大亮点在于始终深耕人物内心,捕捉心灵深处的情感波澜与精神抉择,以个体心灵铺展民族心灵史。作品既刻画了孔志清、高德荣两位独龙族知识分子的典型形象,也描写了俞德俊、和耕等历史人物以及新一代青年群体。青年知识分子孔志清在科学家俞德俊的指引下唤醒民族意识与国家意识,在共产党员和耕的启发下,认清独龙族落后的根源,而“共产党人的模样,让他终生难忘,并从此坚定了一生的追随与信仰”。这份觉醒,让他成长为引领本民族砥砺前行先锋。

透过孔志清的精神蜕变与奋斗事迹,作品生动再现了独龙族从蒙昧落后到涅槃新生的艰辛历程,镌刻出坚韧不屈的民族形象。高德荣作为第二代知识分子的代表,以孔志清为精神镜像,凭智慧与担当引领独龙族脱贫攻坚,成为颇具代表的当代践行者。作者在塑造人物时摒弃程式化拔高,始终贴着人物心灵书写:硬汉高德荣内心藏着对亲人的眷恋、汉族扶贫干部龚婵娟被独龙族老人视作“亲女儿”的温情……这些细腻的情感刻画,如流水般浸润文本,成为牵动读者心绪的情感脉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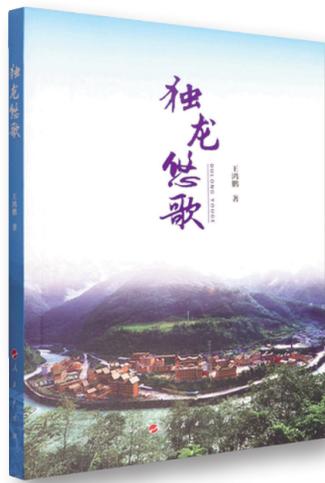
立足心灵与精神,《独龙悠歌》淬炼出诸多兼具深刻性与诗意的象喻。国家意识、个体生命、故乡情结等抽象命题,在作品中转化为“国家的种子”“生命里的独龙江”“灵感穿过雪山”等具体象喻,如明珠深嵌于叙事肌理,营造出隽永绵长的审美意境。这些象喻既富有生活质感、饱含生命温度,又暗合艺术逻辑,在诗意叙事中完成抒情与思辨的融合。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将独龙族音乐“门竹”贯穿始终,其如泣如诉的韵律,既是民族心语的浪漫传递,又与叙事、议论有机交织,为作品注入浓郁的民间气息与在场感,极大提升了文本的审美张力。

《独龙悠歌》匠心独运的艺术结构,彰显了作者的现实主义追求与历史理性精神。上篇“一日千年”、中篇“一跨千年”、下篇“一跃千年”不仅对应独龙族新生、成长、壮大的三个阶段,亦呼应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发展、复兴的历史进程。作者自觉将一个民族的命运纳入国家发展的宏大叙事之中,以显隐交织的双重架构,恰如其分地诠释了“民族成长的壮歌,终将汇入国家命运主潮”的历史必然。

作品对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亦有深刻思考:独龙族女性文面的历史隐秘与文化内涵、“门竹”的审美价值与现实意义,以及高德荣守护民族古居所彰显的文化自觉,均体现出作者的多维审视与辩证思考。不足之处在于,这部分内容的展现略显拘谨,若能打开则更具深度与立体性,让民族文化精神内核呈现得更为饱满。

在主题性纪实文学创作领域,《独龙悠歌》无疑是民族故事书写的重要收获。王鸿鹏以内外兼具的视角,用激情与坚守记录独龙族的百年心灵史与发展历程,为新时代纪实文学的创新表达提供了极具价值的样本。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与创意写作研究中心主任)



《独龙悠歌》,王鸿鹏著,人民出版社 2022年5月

案头的《独龙悠歌》已被我摩挲得边角温润,书中鲜活的面孔和故事,都与我陪同作者王鸿鹏采访的那段时光紧密相连。

2019年6月7日,云南省贡山县委宣传部安排我陪同作家王鸿鹏前往独龙江采访,为撰写《独龙悠歌》准备素材。这位出身军旅的山东人,初次见面便显出严谨务实的作风。我组织本地文史专家同其座谈,他边记录、边录音、边提问,诚恳的态度让现场氛围轻松热烈。

次日,我们驱车前往独龙江乡。三个小时的行程里,他不断向我提问,并用手机记录。彼时,习近平总书记给贡山县独龙江乡群众的回信引发广泛关注,乡里为媒体规划好了采访点,但王鸿鹏指着地图表示:“全乡六个村都要走到,时间不限。”他说,报告文学创作是“深入生活”,是“在泥土上行走的创作”,绝非简单的信息采集。

因语言不通,采访需村干部翻译。每日结束走访后,他都会熬夜整理笔记,反复聆听录音,短短数日便掌握了不少独龙族常用语。村干部称赞他“莱卡呢嘎嘎”(独龙语,意为做事很认真)。当时独龙江尚未开放,村寨条件极为简陋,但此地距乡政府不远,本可以回乡政府住宿,王鸿鹏却坚持吃住在村组,有时就在村委会沙发上凑合一夜,还说:“这种体验对创作很重要。”

在迪政当村,王鸿鹏与独龙族老人李文仕促膝长谈,细问老人的上山经历与见到习近平总书记时的情景;在脱贫典型白忠平的客栈,他与村民围着火塘共饮同心酒,结为好友;龙元村的“国家马帮”往事、马库村的独龙族民歌“门竹”、哈湾瀑布与中缅41号界碑的守护故事都被他一一记录在笔记本上。每到一处,他都会主动结清食宿费用,还购买本地特产寄回山东,说是为宣传独龙江特产助力。在独龙江上游,他鼓起勇气体验溜索过江,只为获得更真切创作感悟。

6月12日,我们采访了独龙江边防中队,王鸿鹏对官兵守卫边民的故事深表敬意,直言要将其作为书中的重要章节。次日在独龙族博物馆,看到老县长高德荣当年首次与山外通话的手机,他感慨:“从‘木刻传信’到‘5G通信’——独龙族跨越千年的变迁,就是这部作品的主线。”

6月14日晚,我们与高德荣老县长座谈至凌晨两点。老县长正在建设独龙江通往西藏的公路奔走。次日,我们去他居住的竹篾房里继续座谈。老县长用自家种的玉米和土豆招待我们,详细讲述了独龙江的历史与脱贫攻坚历程,却对自己带领群众修路遇雪崩、辞官返乡等事迹轻描淡写。即便谈及童年苦难与已故母亲时难掩伤感,也未多言。这次采访让王鸿鹏深感遗憾,觉得未能挖掘到老县长背后的深层故事。

## 三进「秘境」,情系独龙

——记王鸿鹏的采访经历与《独龙悠歌》的「诞生」

□丰茂军(傣族)

6月16日,乡长孔玉才动情地讲述了推进安居房建设、动员群众搬迁的经历,还将祖父孔志清(独龙江乡首任乡长)的数十篇回忆录赠予王鸿鹏,让他收获颇丰。

因另一部脱贫攻坚作品亟待付梓,王鸿鹏不得不结束采访。6月17日我们返回时,途中突遇泥石流,司机猛踩油门惊险冲过,身后路面瞬间被掩埋。抵达贡山县城后,他立刻采访交通部门工作人员和曾为高德荣开车的司机,还原当年遭遇雪崩的险情,随后又赴县档案馆查阅历史文献,拍摄大量资料带回研究。临别时,他坦言两大遗憾:一是未能深入采访高德荣;二是因独龙江上游修路和连日降雨,江水浑浊,未能见到一江“流动的翡翠”。

返回山东后,王鸿鹏始终关注独龙江的动态,我也时常通过微信发送相关资料。没想到当年11月初,他便重返独龙江,在怒江州乡村振兴工作队挂职。彼时我在迪政当村驻点,他特意带着大米和食用油来看望我。此时“秘境”独龙江已全面开放,乡村面貌焕然一新。12月中旬,他与我道别时,欣喜地说两大遗憾已弥补——不仅与高德荣一家结为挚友,跟随老县长工作生活十多天,老县长还赠给他自己创作的歌曲光盘,并为他穿上独龙族服装。

令我意外的是,次日他不顾山高路远,又搭便车从贡山县城折返。原来他听我说过贡山县机关干部吴国庆曾六次进独龙江扶贫,便想采访他。本想约在县城采访,吴国庆当天又因工作无法前来。王鸿鹏坚持当面采访,不愿以电话替代,于是有了三进独龙江的行动。当晚,他与吴国庆围着火塘长谈至深夜,兴奋地告诉我:“独龙族从‘直过民族’,到马帮时代,再到脱贫攻坚、全面小康,七十年的历史脉络终于完整串联起来了。”

离开独龙江后,他又赴昆明采访了云南省文联驻马库村扶贫队长龚婵娟、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副所长李金明等,直至12月底才返回山东。

一部《独龙悠歌》,浓缩了独龙族的百年沧桑与新时代的脱贫攻坚。作者三赴“秘境”,用脚步丈量江峡村寨,用心贴近独龙族群众,让创作深深扎根现实。再次抚摸这本书,那段难忘的采访经历与深厚友谊涌上我的心头,正如我们傣族族的谚语所说:“不努力是不会把事情做好的。”总之,与《独龙悠歌》和王鸿鹏的故事令我终生难忘。(作者系诗人)



贡山独龙族“卡雀哇节”

## 一曲悠远绵长的羌寨雅音

——评诗集《暮见》

□周维强

羌族诗人高璐的诗集《暮见》里的四辑诗歌各具特色:“汶月清歌”里的诗宛如乡间民谣,诗人将笔墨聚焦故乡的风物,每一首诗都是赤子对乡情的回望和感怀,“汶川”的诗歌意象在诗人笔下变得具象而立体,既带着乡愁又带着情愁;“羌格尾音”好似吟唱,在羌地拓本、母语脉息、羌山日月月中完成对民族图腾和文化底蕴的深度探索;“时间薄影”恰如摇滚,诗人用灵性的语言向内探索心中的感悟,用心用情理解现实生活带来的精神思索;“且行且吟”更像是大合唱里的和声,诗人化身行为吟诗人,漫游在祖国的山河之间,书写李白般的浪漫和王维式的诗画情境。

高璐诗歌中的音乐属性,指向的是内心隐秘的部分。诗人的内心简洁而明亮,宛如舒缓的钢琴曲,展示着对自由的追求。比如《守在窗边的稻草人》中,诗人以稻草人自喻,表达了她对田园生活的向往,以及一个人在城里生活的困顿与矛盾。全诗的节奏很有层次感,诗人对词语的筛选和选用可谓煞费苦心。女诗人细腻的情思,在其诗歌中表露无遗。

高璐的诗歌呈现出少有的深远意境和醇厚美感,其诗歌字词精简,并没有多余的炫技,只有朴素的追寻。读高璐的诗,宛如踏上了一条幽秘的山间小径,诗人在小径两旁种满鲜花,让我们赏花的同时,感受美的延伸。她写马岭山、红军桥、七盘沟、老街、龙池、族谱、羌人谷,不是泛泛而谈的

记录,而是用心发现独特的诗意,提炼心灵的感觉,多读几遍更是能从中窥见一个诗人的写作自觉。

高璐始终铭记自身的民族根脉,以诗歌为载体,颂扬羌族的悠久历史,呈现民族的深厚文化。“羌格尾音”里的诗宛如一册羌族文化的图谱,从羌地的山川草木、民俗礼仪,到祖先的迁徙足迹、族群的生存智慧,皆是她捕捉的核心意象。高璐的写诗视角,植根于追逐自由的心境,她的目光与笔触,总能抵达一种空灵澄澈的境界,既抒发真切心绪,又饱含浓郁的生活气息与鲜明的情感特质。《族群》《飞鱼,羌》《五月浮屠》等作品尤为典型:诗人将自身的气韵、心绪、感悟,对祖先的敬畏、对文化的致意,统统融入诗歌的肌理之中。读来如品茶,暗香浮动,字里行间满是闲适淡然的意境,让读者在诗中触摸到羌族文化的温度与精神内核。

诗集《暮见》是诗人精心构筑的艺术城堡,读者循着文字的高台拾级而入,便可尽览汶川的山川风物与人间烟火。掩卷之时,仿佛聆听到一曲悠远绵长的羌寨雅音,温润醇和,余韵不绝,自然之美与诗意之光相伴始终。诗人将日常里琐碎的诗意一一打捞、沉淀,凝注于卷册之间,也让每一位阅读者在文字里,获得关于生命、故土与民族的全新思索。

(作者系青年作家)

## 理性与感性的有机融合

——评报告文学《壮哉!桂西北》

□谭萃颖(傣族)

近年来,报告文学创作始终在“纪实性”与“文学性”的二元维度中博弈,并不断探索二者的内在融合。如何在写实记录与情感叙事之间构建动态平衡,实现真实与虚构、理性与情感的有机熔铸?如何立足个体思考和叙事伦理,进而凝聚地域乃至民族层面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些都是报告文学寻求突围的重要命题。长篇报告文学《壮哉!桂西北》以桂西北地域叙事为载体,在纪实与情感的交融中,完成了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审美表达。

《壮哉!桂西北》充分释放了报告文学的审美潜能,在恪守“真实”这一纪实伦理的前提下,以真挚的修辞策略与情感的审美想象为媒介,重构受众对于“报告”的认知。作品的内在审美张力,在于“客观记录”与“主观介入”的辩证交融。这样的博弈与共生,既未僭越非虚构写作的真实边界,又赋予文本以充沛的情感张力与承载时代精神的现实品格。

尽管写作者以冷静的纪实笔触勾勒出广西河池地区的山乡巨变,但在叙事过程中,现实事件和时代氛围的沁润,促使作者调动个体生命体验和情感储备,不经意间流露出强烈的情感倾向与价值判断。全书叙述了河池地区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文本扎实的“现实感”夹杂着叙事主体的“在场性”。这种双向触动的交互过程,使作品既维系了现实叙事的可信度,又兼具“情动美学”的感染力,实现了纪实与抒情的有机共生。

作品既坚守事无巨细的现实精度,又以文学手法营造深厚的审美意蕴。其核心审美特质契合了朗吉弩斯《论崇高》中所提倡的美学内核——崇高的对象以其磅礴力量唤起人的尊严、自信与强烈情感,这种审美体验既存在于自然与社会,也沉淀于艺术文化中。第一章《苦难与荣光》对河池穷困史的书写,便反映出当地民众在荆棘中淬炼的历程。贫瘠的土地、闭塞的乡间、匮

乏的认知,如难以翻越的布满怪石的悬崖峭壁一般,桎梏着幸福之路。然而,河池人民并未被自然之力压倒。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激发了他们顽强不屈的抗争精神,最终铸就改天换地的荣光。这不但唤起人们对生命的敬畏,还彰显出崇高美学的力量感,更让一代代河池人民在同舟共济、荣辱与共的集体记忆中,凝聚起稳固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作者在书写地方风物、人情世故与奋斗史时,以比喻、象征、排比等文学手法营造观感、美感与力量感,潜移默化中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讲述东兰县韦胜难的事迹时,作品以“大同乡夜晚的星空”比喻其纯洁的人格和道德魅力,又以“成群的星星蜂拥而至,铺满前路、照亮眼眸”的意象完成情感的升华。韦胜难的个体坚守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桂西北民众集体奋斗的缩影。这种虚实相生的叙事策略,有效把握了纪实与抒情的边界,在对历史真实与叙事情感的重构中,传递出民族精神内核,强化了作品的可信度与感染力。

作者以地域叙事为切入点,将桂西北独特的山川风貌、风物人情等地方性内容,升华为生存、奋斗、乡愁及传统与现代冲突等普遍性命题。如作品中提及的歌圩,既是壮族青年表达爱情的习俗,又是民族文化传承的非物质形态。其文化流动性不仅维系着民族情感,更在跨地域的意义延伸中,构建起地方性与普遍性的叙事张力,使文本超越单一地方志的局限,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兼具地域基因与普遍意义。

总而言之,《壮哉!桂西北》以纪实美学的严谨坚守着历史真实。虽然在某些章节的分寸把握上尚有提升空间,部分段落的美学内核——崇高的对象以其磅礴力量唤起人的尊严、自信与强烈情感,这种审美体验既存在于自然与社会,也沉淀于艺术文化中。第一章《苦难与荣光》对河池穷困史的书写,便反映出当地民众在荆棘中淬炼的历程。贫瘠的土地、闭塞的乡间、匮

(作者系《南方文坛》编辑)

